

第 一 篇

对当代中国的期待

第一章 汤因比与罗素的中国观

一 致汤因比的信

1969年 我受读卖新闻社委托与汤因比通信 信中提出了以往欲向汤因比提出的几点疑问。不巧恰逢汤因比身体状况不佳，因而没能得到答复。结果我把该信发表在《世界》杂志上了。

1967年我在夏威夷逗留期间，曾偶然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花花公子采访”栏中看到汤因比的谈话，我在信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那个谈话的。

《花花公子》杂志本是庸俗的美国大众杂志，唯独“花花公子采访”栏以著名学者为采访人，被采访者也多系世界名流。汤因比的上述谈话相当长，且有实质内容。这是我初次看到这本杂志。

我所以要去夏威夷，是因儿子和儿媳去欧洲、美国已近一年，说回国时途经夏威夷，于是我便和妻子携两个孙子去夏威夷迎接他们。当时儿子说：“因为父亲对汤因比很感兴趣，所以……”说着便把那篇谈话指给我看。所以我看到汤因比的谈话实出偶然。

汤因比早就说过：世界政府是必要的。当今人类——或许可以说是文明，正接受严峻的挑战。那就是令人毛骨悚然

的核武器，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这些问题单靠某个国家或某一区域的国际合作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靠全世界的努力。汤因比即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阐述世界政府的必要性的。与这一问题相关联，采访者在“花花公子采访”中问道：

“在预测未来的世界秩序方面，您有何高见？”。

对此，汤因比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世界正在恢复秩序，不久的将来，人类必然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即使在自由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换取秩序。……人类也许将处在苏美或苏、美、中的专制统治之下，人类如果相信付出这样的代价将能确保富足与和平的话。这曾经是公元前一世纪地中海诸民族的精神状态。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欢迎奥古斯都的专制统治，并使那种专制统治成为可能。如果当今核时代的125个独立主权国家（世界上的独立主权国家，1969年时确是125个，现在已经有144个了*）仅仅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互相攻伐的结果，只能使人类归于灭亡。这些独立主权国家求得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自动地服从于世界政府。苏、美操纵的世界政府可能是极具权威性的，但这种世界政府至少能保证人类生存下去。”

二 我的提问——两种世界国家的区别

针对汤因比的谈话，我提出了下述问题。

• 著者指的应为1978年的数字。——译者

“您的这种预测未免太悲观了，这也许是根据您所说的‘我们虽然在技术上已进入原子时代，但道德上却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那个半玩笑半认真的、关于文明与人类的根本看法而提出的吧。尽管如此，这种预测也是过于悲观了。您在这里使用的‘世界政府’一词，与作为您的历史观基本理论而使用的‘世界国家’概念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也是我要请教的，因为它与我们这些世界联邦理想信奉者所使用的‘世界政府’概念有很大距离，也许用‘我，这个词比‘我们’更合适些。我所追求的世界政府的形式，是象《世界宪法芝加哥草案》所展示的那样，所有的国家在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下组成联邦。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并担任《芝加哥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的罗伯特·哈钦斯博士，曾于前年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给大地以和平，会议……’”

“给大地以和平”一词来自拉丁语。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曾发出过名为和平倡议的敕语，这次大会便是以该敕语的名称命名的。

“哈钦斯博士在出席那次会议之前曾来日本，我与几位同事同他进行了约一小时的会谈。当时，从博士的谈话中得知，《芝加哥草案》的修改工作仍在进行，而且还得到了您的协助。这使我愈加迫切地想了解在“花花公子采访”上发表的您的谈话的真实意图。

“日内瓦‘给大地以和平’会议闭幕那天，会议发起人哈钦斯博士把来自世界各国约三百位代表的一致见解归纳为11项要点，写出了报告。我觉得它的总精神是肯定世界政府的。但我并不认为这仅仅因为哈钦斯博士是世界联邦的热心倡导者。”（参见谷川彻三《自由人的立场》平凡社，1975年，

三 汤因比的回答——《图说历史研究》

我提出的问题没能得到汤因比博士的直接答复，但我认为博士在1972年发表的《图说历史研究》中，显然包含了对我所提问题的回答，因而我想谈谈这一点。

汤因比在该书第38章“未来是否属于世界国家”中说：

“……人类免遭灭亡的唯一途径，是在长期的专制政治下生活。如果要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我们就必须同时研究历史上世界国家的利弊。”（桑原武夫等译，A·汤因比《图说历史研究》，学习研究社，1975年，第378页）

我在这里插一句，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是把“世界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概念使用的，但又认为世界国家是某种文明末期出现的现象，并认为文明一般历经“产生”、“成长”、“挫折”、“解体”四个阶段。汤因比最初列举的21到23种文明，迄今大部分已解体。继1961年的《再考察》列举出21到23种文明之后，汤因比又修改其观点，认为大文明有13种，大文明周围的“卫星文明”有15种，但是关于文明历经四个阶段的观点却没有改变。他认为目前尚未解体的文明有西欧文明、希腊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亚文明5种。

这里我要探讨的是东亚文明。东亚文明以大文明中国文明为核心，其周围有3种“卫星文明”，即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过去，越南文明未被列进来，朝鲜文明也是同日本文明一起看待的，后来才变成现在这种看法。然而，不管

这些“卫星文明”是如何划分的，关于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本体的观点却始终没变。

让我再次引用一下汤因比的原话。

“……人类免遭灭亡的唯一途径，是在长期的专制政治下生活。如果要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我们就必须同时研究历史上世界国家的利弊。”

接着汤因比又说：

“未来的世界国家，也许应该不折不扣地拥有整个世界。”

四 未来的世界国家的特色

汤因比所说的历史上的“世界国家”，无论是希腊文明的世界国家，还是东亚文明的世界国家，实际上都是地区性的；与之相反，我们现在探讨的旨在使人类免遭灭亡的世界国家，则必须是全球性的。以下我再继续引用汤因比的话。

“未来的世界国家，也许应该不折不扣地拥有整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国家象以往的通例那样仅是某种文明的产物。西欧人考虑问题时，往往一味地假设自己的文明价值和目标将永远统治世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将会发生的事态，恰恰与之相反，未来的世界国家也许会从自发的政治联合开始，而在那个世界国家中，现存的大量文明要素可能会全部保存下来。……多种文明和文化传统将必须学会在单一的政治体制下共存。所以，我们向历史上的世界国家学习的最有益处的一个教训，就是相互竞争的各种文化怎样才能共存，怎样才能取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前揭《图

说历史研究》日译本，第378页）

以上原文介绍的是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第38章中的论述。以下我想将它后面的论述用我的语言概括一下。

“事实上；过去的世界国家，也包含一种乃至两种以上不同的文明领域及蛮族区域，并且本身具有相互连带感。而少数受迫害者及文化上受到不公正压迫的隶属民是不可能具有这种人类家庭的连带感的。因此，世界国家的建设者们，已讲求实际地考虑到容忍本领域内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宽容的表现之一，是允许不同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即使在未来的世界国家中，或许也会保证语言和宗教自由。总之，未来的世界国家，是从根本上有别于历史上的先例的。”

最后，汤因比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未来的世界国家，不但不会象以往的先例那样，是宣告某一濒临死亡的文明死刑的世俗纪念品，而且其本身自始就蕴含了已在高级宗教中明确了的精神运动的种子，并将深思熟虑地、自觉地促进那颗种子的萌发和生长。”

（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第379页。）

五 两种“世界国家”的区别

我想再次概述一下前文触及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即文明历经产生、成长、挫折、解体四个阶段，而“世界宗教”或“世界教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产生文明的母体。在文明的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少数创造者”是作为主力活动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遇到挫折，随后开始解体。

文明的解体，就“希腊文明”而言，源于日耳曼民族即

境外蛮族——称其为外部无产者——的进攻和压迫。但更重要的是希腊文明内部的“内部无产者”——就希腊文明而言，它们是基督教徒——创造了“世界教会”，形成了希腊文明之子即西欧文明的母体。当进入希腊文明末期即所谓罗马时代时，恰好出现了当今世界上到处可见的那种统治阶层的颓废，希腊文明是因为这种颓废和内部无产者的压力而从内部崩溃的。这种状况与日耳曼等蛮族的外部进攻和压迫相呼应，形成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迫使希腊文明走向解体。这就是汤因比的观点。

汤因比所说的过去的“世界国家”，是在这种解体期力图通过中央集权来制止某种文明解体的产物。而未来建立的全球性的“世界国家”，不能采取过去那种形式，即不能采取1967年汤因比在“花花公子采访”中所说的那种具有巨大权力的专制形态。现在再引用一遍汤因比的论述，他说：

“……未来的世界国家，不但不会象以往的先例那样，是宣告某一濒临灭亡的文明死刑的世俗纪念品，而且其本身自始就孕含着已在高级宗教中明确了的精神运动的种子，并将深思熟虑地、自觉地促进那颗种子的萌发和生长。”

记得我在给汤因比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您一面使用“世界政府”一词，一面又说世界将被置于美、苏或美、苏、中的专制统治之下并将失去自由，但那种“世界政府”与我们理想的建立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之上的“世界政府”相距甚远，不如说更接近于您所理解的在所有文明的末期出现的那种“世界国家”，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与以往的“世界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前面两次引用的汤因比的那段论述，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即认为过去的

世界国家，虽然称作是“世界国家”，但实际上却是地区性的，而未来的世界国家必将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未来的世界国家将是这样一种情形，与过去的世界国家中那种“少数统治者”（这也是汤因比的用语。他认为“少数创造者”创造文明并使其成长，但“少数统治者”只是掌握政治权力，因而仅仅是竭力维持那种濒临解体的状态）不同，它自始就具有各种文明自发地创造它的意志，因此它不是专制型的，它必然含有和以往的“少数创造者”极其相似的、那种在创造若干种文明时所具有的精神运动的种子，必然是在深思熟虑地、自觉地促进那颗种子的萌发和生长的形态下建立的。所以，尽管它仍被称作“世界国家”，但与以往在某一文明末期出现的“世界国家”是根本不同的。这就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政府”极其相近了。我之所以说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中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理由即在于此。*

六 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

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中，显然考虑了未来全球性的“世界国家”或“世界政府”的核心。在第49章“同时代文明接触的各种心理后果”中（如果用我的话解释，则汤因比在这里比较了西欧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的生活方式，认为西

• 以上著者已论述了汤因比所说的历史上的“世界国家”与未来的“世界国家”的区别，为便于读者理解，后述的历史上的“世界国家”一律译作“统一国家”。——译者

欧的生活方式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的生活方式是以牢固的稳定性为核心的），他这样说：

“如果继西欧目前的统治之后，出现文化的统一和融合，那么西欧的活力性和中国的稳定性或许会十分和谐地配合起来，产生对人类来说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能使人类生存，而且能确保人类的幸福。”（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 第522页）

实际上，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已经阐述了与此类似的想法。《历史研究》1至3卷首先于1934年出版，接着4至6卷于1939年、7至10卷于1954年、11卷于1958年、12卷《再考察》于1961年也先后出版了。在此期间，汤因比在基本保持其理论一贯性的同时，也多处修改乃至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汤因比极为坦率地讲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

现在，在尚未完全解体的5种文明中，西欧文明最有力量，它给予其他4种文明以巨大的冲击。但在今天，以布尔什维主义形式表现的对西欧文明的反击已经开始了。在未来的世界中，这种布尔什维主义形式的希腊东正教文明的反击，即俄国革命，也会显得微不足道，更大规模的反击可能来自印度和中国。在那个未来的世界上，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东正教徒等现代人走过的历史，也将成为西欧历史的一部分。

汤因比的这些看法，与前面引用的他的论述，即各种文化和文明的渗透融合，必将建立起未来的世界国家的观点，是直接相联系的。

下面的引文，也是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讲的。

“我们的子孙，将不会是我们现在这样单纯的西欧人的子孙。他们将既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提诺的，又是孔子或老子的后继者；既是第二艾赛亚及耶稣基督的，又是释迦牟尼的后继者；既是伊莱贾、伊莱沙、彼得、保罗的，又是琐罗亚斯德及穆罕默德的后继者；既是克莱门斯、奥里根的，又是商羯罗及罗摩奴阇的后继者；既是我们非洲的奥古斯丁及安布里亚的贝来狄的，又是卡帕多西亚东正教会教父们的后继者；既是布里索的，又是伊本·赫勒敦的后继者；既是克伦威尔、华盛顿、马志尼的，又正在成为列宁、甘地、孙文的后继者。”（深濑基宽译《文明经受着考验》）现代教养文库 第121页）

让我对汤因比的这番话再做一些解释。首先，“我们”指的是西欧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提诺都是希腊人，是希腊文明的象征。孔子和老子是东亚文明的少数创造者。第二艾赛亚是旧约中的预言家。耶稣基督本是古代犹太民族之神耶和華，他是嫉妒神、怒神、憎恶神，而基督教把他变成了爱神。由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而是成了世界宗教，并从中产生了“世界教会”。以这个“世界教会”为母体，产生了西欧文明。

伊莱贾、伊莱沙、彼得、保罗是旧约中的预言者，新约的使徒。琐罗亚斯德是古代波斯宗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开山鼻祖。克莱门斯、奥里根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徒。商羯罗、罗摩奴阇则是印度教的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即圣奥古斯丁，贝来狄则是所谓贝来狄教派的创造者。卡帕多西亚指的是现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但希腊东正教这种形式

的基督教却是经这一地区的教父们之手产生出来的。它是与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以及其后的新教形式不同的基督教。

布里索是法国著名的神学家，伊本·赫勒敦是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克伦威尔是领导英国清教徒革命的人物，华盛顿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建国之父，马志尼是意大利独立之父，列宁是俄国革命之父，甘地是印度独立之父，孙文是新生中国之父，是深受国民党和新中国的开创者们敬重的人物，成了东亚新文明的支柱。

这里汤因比所说的意思是，上述各种文明的“少数创造者”，也会成为西欧人的精神祖先。

为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有必要重复一遍前面业已引用的汤因比的观点。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中说：

“如果继西欧目前的统治之后，出现文化的统一和融合，那么西欧的活力性和中国的稳定性或许会十分和谐地配合起来，产生对人类来说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能使人类生存，而且能确保人类的幸福。”

汤因比的这段话，与他在同部著作中阐述的下述观点是紧密联系的，即未来的“世界国家”的形式，不同于他在《历史研究》中作为基本概念使用的古代“统一国家”（古代“统一国家”是某种文明末期即解体期时出现的现象）。它在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孕含着高级宗教所具有的精神运动的种子，并且必然促进这颗种子的萌发和生长。

七 西方是分裂的，中国是稳定的

现在接着探讨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第49章中的论

述，我想引用一下从该章中提取出来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观点。

“……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

1920年，罗素曾随工人党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会见了列宁和托洛斯基，他虽然高度评价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但也发现了其弱点。《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理论》一书，是他在那次访苏后写成的，联系今天苏联的现实，看得出当时他就已经预见到苏联革命的进程。那次访苏之后，他接受中国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进行了约一年时间的讲学。1921年回国后，第二年便写出《中国问题》一书，这也是一部令人惊叹的著作，它虽然是50年前写的，但却清晰地预见了今天中国的情形，毫无过时之感。在这部著作中，罗素对中国文明和西欧文明、中国人与西欧人进行了比较，可以说基本阐述了汤因比在《图说历史研究》中阐述的观点，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去谈，这里想继续引用汤因比的论述。

“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
(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 第522页)

“看来仅依靠西欧不会使人类实现世界政治、精神的统一。”

“要使西欧业已动摇的人民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要把西欧的力动性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而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那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不能不认为这种动力的创造者将在中国出现。”(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 第523页)

这些观点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较为稳妥地提出来的，但我认为实际上它已成为汤因比晚年的坚定信念，因此他又说：

“他们的历史形成中反映的历史世界观命令他们，要使人类生存到21世纪，就必须由当今人类的某个部分来完成统一和稳定的重任。”

这里稍做一下解释。汤因比说的“他们”是指中国人。“世界观”一词是特意用德文写的。这里，汤因比提示了“要使人类生存到21世纪”的条件，他如何深刻地认识现状由此可见一斑。除汤因比外，许多人也在忧虑，人类也许在21世纪到来之前突然濒临灭绝，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汤因比之所以对中国寄予如此厚望，是因为在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只有中国历经二千余年，其间虽然发生过改朝换代，但却始终保持了文明性质的一贯性。汤因比无论是早期提出21到23种文明时，还是《再考察》后提出13种大文明和15种卫星文明时，都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文明具有的这一特点是令人惊叹的。

汤因比对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认为埃及文明是极为稳定的文明，但这种文明很早以前就解体了。而中国文明若将其上古文明也包括在内的话，则在继埃及后出现的更新的希腊文明早已灭亡了的今天仍然健在着。汤因比把中国文明的这一特点称为稳定性、持续性，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八 中国走非过度工业化的中间道路

汤因比接着说，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领导者们，决心从根本上断绝前工业农业文明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这是事实。同时也决心避免象俄国和日本那样把自己生活方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向西欧那样的极端，这似乎也是事实。”

汤因比指出，美国文明和革命后的俄国文明，是片面推进高度工业化的，而中国则正在推进保持农工平衡的文明。

“看得出来，中国人正在探索一条既能结合传统的前工业生活方式和最近西欧及西化诸国所实行的工业生活方式这两者的长处，又能回避其短处的中间道路。”

汤因比所说的“中间道路”英文中是“**a middle way**”，因为加上了“**a**”这个不定冠词，因而就不是“**the middle way**”即唯一的道路了。“中间道路”一词，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西欧，许多哲学家在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是把它作为重要概念使用的。中间道路的理念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未必是单一的，它的原理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的，因此汤因比使用了“**a middle way**”一词。

九 汤因比与罗素的中国观是一致的

汤因比的原话就引用这些，而这些观点几乎完全是罗素在1922年发表的《中国问题》中阐述过的。

如前所述 罗素于1920年5月19日至6月17日访问了革命俄国，会见了列宁和托洛斯基，但他对革命后的俄国不免感到失望。同年，罗素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哲学，一年后途经日本归国，1922年发表了《中国问题》，这的确

是一部令人惊叹的著作。1970年，这本书经牧野氏翻译，由理想社出版了。我最初看到的也是牧野氏的译本，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因为书中预见了当今中国的现状。罗素在该书第1章“问题点”中说：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人民，当其他国家的人民想到今后十年时，中国人民却想到了今后一百年。中国人民本质上是不灭的人民，是不急不躁的人民。”（罗素《中国问题》日译本第22页）

罗素在这一章中概括性地提出了各种问题，并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发现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欧洲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争斗、剥削、不稳定的变化、不满及强烈地寻求破坏。导致破坏的效率主义最终只能使人类灭亡。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慧，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使人类的彻底灭亡。”（前揭《中国问题》日译本，第22—23页）

罗素的这番话完全可以换成汤因比的下述说法。汤因比说过，当前，现代文明正面临挑战——核武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这就是说，罗素已清醒地预见到机械文明的未来。

罗素对中国人的评价是：

“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温厚典雅。在有助于人类幸福方面，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优越。在中国，年轻的改革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如果能给他们一点时间，就能